

公共政策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性别与职业的视角

孙 凤

Sun Feng

李 海峰

Haifeng Li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a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that first, social justic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econd, the higher rank occupation is, the higher subject well-being is; third, Occupational female has more work happiness and less life happiness prior to male .

Key words: subject well-being, social security,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82,321亿元, 比上年增长10.2%, 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位居第6。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社会形势蓝皮书指出, 2005年有72.9%的城乡居民感觉幸福, 比上年下降了5%。以上数据表明民众的幸福感受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反而出现负增长。基于此,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分配机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良后果, 最为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带给民众的不公平感是否会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 本文从性别和职业的视角探讨二者的关系。

本文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 对幸福感的测度、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做一介绍, 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简单回顾, 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 第三部分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变量的测量和定义等问题进行描述; 第四部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公平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第五部分引入被调查者的性别与职业特征, 分群体研究公平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幸福感的测度及现有研究的简单回顾

幸福生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大同社会”、“升平之世”和“小康之家”都是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18世纪末英国伦理学家边沁也提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来度量个人和社会的苦乐, 进而解释个体与社会的利益调整以及个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幸福生活包括: 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 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和群体间的认同关系, 反映人类从社会关系中寻求归属感; 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 反映个体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领悟(陆汉文, 2005)。

对于幸福生活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评价, 其中对幸福生活的主观评价称为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有三种理解: 基于情感层面的快乐感、基于认知层面的满意度, 和基于体验层面的价值感(风笑天, 林南等, 1998)。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有显变量与潜变量之分, 显变量是指通过一个指标来反映幸福感状况, 如问及“总的来说, 您现在幸福吗”,

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 和欧洲社会调查 (Eurobarometer Survey) 都是通过设计单一的问题调查人们的幸福感。然而这种测量所得到的幸福感属于情感层面的快乐感受, 往往变动不居, 是瞬间的情绪。潜变量是指将幸福感细分为若干方面, 每个方面选取一些指标编制幸福感指数, 如总体生活满意度调查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Diener 1985), 这种分析方法能够得到认知或体验层面的感受, 进而能够获得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态度与意愿的信息。

在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上, 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收入、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等因素上, 特别是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其中, 有研究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的幸福感关系, 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 2004年对全世界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 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 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 美国排到第15名, 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在第42、48和49名¹⁾。另外也有研究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如 Easterlin(2001) 发现美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0; Diener(1999) 等对英国居民的研究显示, 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关于政治经济制度和习俗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Bruno (2000) 运用瑞士的居民调查数据分析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影响显著。Rose (2003) 研究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对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政府福利政策的变动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Alesina等人 (2004) 的研究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Diener (2003) 认为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个人人口特征与幸福感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曾假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的幸福感会呈

下降趋势, 然而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Blanchflower & Oswald(2000) 对美国和英国居民的研究表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 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Oswald (1997) 以发达经济为背景, 对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种族、进行了概括, 认为幸福感较高的人群包括: 已婚、高收入者、白人、受过良好教育、自我雇佣等。Oswald认为这些结论具有普适性, 即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甚至幸福感的不同测度形式都成立。而关于性别与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者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近年来, 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由于在幸福感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 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曾慧超、袁岳 (2005), 罗楚亮 (2006) 采用显变量测度幸福感, 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 您现在幸福吗?”, 得出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邢占军 (2006) 采用潜变量测度幸福感, 调查了10个方面的内容, 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体验, 得出了城镇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

国内外文献考察表明, 在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讨论中, 对收入给予特别的关注, 而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一制度因素考虑不多; 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比较关注较多, 而对性别、职业的讨论较少。本文认为, 一方面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讨论不应该离开社会经济转型这一制度背景的, 因为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是利益的重构过程, 利益的变动会对各阶层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 两性关系平等是判别人与人关系和谐与否的基本标志, 而职业关系平等则能够反映社会关系的和谐。基于这一思考,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点在于:

第一、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在社会经济转型中, 传统社会保障解体, 本应当由国家提供的

1) 相关研究见<http://thehappinessshow.com/HappiestCountries.htm>。

社会保障如教育、医疗让位于市场,增加了居民生活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收入分配领域,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居民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也会对其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对公平感的考察是基于民众的主观认识。本文从民众对于收入分配、住房政策、就业机会、医疗保障、教育机会五个方面来判别民众的公平感。对幸福感的考察是基于满意度调查,包括民众对收入、工作状况、人际关系、住房状况、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判断。正如前文指出,只有通过多个指标的测度才能获得比较稳定和持久的态度与意愿信息,才能保证研究中所用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这对于研究社会经济转型与民众幸福感的关系,具有分析上的现实性与方法上的可操作性。

第三、在幸福感的研究中突出性别和职业差异。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极力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同时积极实施“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男女工资差异是很小的。但是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Qustafsson, 2000; 李实, 马欣欣, 2005),这些研究反映出妇女更多地承受着转型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镇男女16岁以上从业率之比为76.9%低于1995年;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

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1978年,这一数据为83%。从社会保障来看,2004年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较1999年仅增加0.2个百分点²⁾。

另外,两性间在职业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见表1)。女性在工资和职业声望较高的“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上的分布低于男性,而在“离退休”与“其他”上则高于男性,尽管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布上高于男性,但工资水平却低于男性。根据“拥挤理论假说”(Bergmann,1974),男女工资差异不仅源于同一职业对女性的歧视,而且来自于职业分布对女性的不利,因为能够对女性开放的职业远远少于男性,她们很难进入男性主导的职业,女性劳动者对有限职业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工资水平的下降。本文认为,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区隔和拥挤,带给女性的不仅是低工资,而且进一步影响到其幸福感。

第四、以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幸福感与各个影响因素的关系。本研究认为即使借助潜变量来研究幸福感,但如果没有先进的方法体系来获取幸福感的多维度的综合特征,很难得到一个关于幸福感的综合判断。因此,本文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亦称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LISERL),建立指标与潜变量,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探讨幸福感的生成及其决定因素。

表1 两性从业人员职业构成及月工资比较

职业	男性就业人员		女性就业人员	
	职业构成	月均工资	职业构成	月均工资
党政机关干部	5.0	3458	4.3	3301
企业管理者	7.6	3873	4.2	3517
专业技术人员	12.3	3138	14.4	2751
工人/商业服务人员	23.6	1609	18.4	1722
个体私营	11.4	3297	7.9	2576
外地来京务工	1.6	1000	0.8	821
离退休	18.8	1594	25.4	1132
失业下岗	7.5	583	6.4	375
其他	12.3	412	18.3	321

资料来源：“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建设居民意向调查”数据整理

2)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组, 2006,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 《妇女研究论丛》, 第2期。

三、数据和测量

(一) 样本选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统计局“2005年北京市和谐社会建设居民意向调查”，该项调查以北京市居民户电话号码为抽样框，采用随机拨号电话访谈的方式取得样本，有效样本量为2113个。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变量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体特征，如性别、职业等；第二部分是幸福感状况，包括五个操作性指标；第三部分是社会公正状况，亦有五个操作性指标。

本次调查的职业分类共有15类，本研究将其合并为9类，分别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公司干部/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工人/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私营”，“外地来京务工”，“离退休”，“失业、下岗”，“其他”。样本的统计分布见表2。另外，样本的信度检验见附表（从后两列可以看出，每个问题的区分性都比较好）。

(二) 对潜变量的测量

1、幸福感

对于幸福感潜变量，我们通过本次调查的5个满意度观测指标予以反映，指标内容包括对收入、工作、居住条件、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这5个变量均为定序变量，“1”为最满意，“5”为最不满意。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讨论解释变量如何影响幸福感，笔者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描述幸福感的5个测量指标做进一步的划分，试图将“幸福感”细化为多个新的更加准确的潜变量，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测量“幸福感”的5个指标可以进一步细分为2个新的潜变量。第一个潜变量包含的测量指标为“您对目前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您对目前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和“您对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而第二个潜变量包含的测量指标为“您

表2 样本的统计分布

	频数	频率
男	988	46.8
女	1125	53.2
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干部	94	4.4
企业/公司干部/管理者	117	5.5
专业技术人员	270	12.8
普通工人/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	421	19.9
个体私营	193	9.1
外地来京务工	23	1.1
离退休	450	21.3
失业、下岗	139	6.6
其他	312	14.8
缺失数据	94	4.4
Total	2113	100.0

表3 幸福感的因子分析

	主成分1	主成分2
Q10 您对目前个人收入的满意程度	.164	.802
Q11 您对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	.049	.824
Q12 您对目前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	.657	.170
Q13 您对目前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	.742	-.041
Q14 您对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	.751	.170

对目前个人收入的满意程度”，“您对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从第一个潜变量包含的测量指标看，其所表示的是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而第二个潜变量则表示受访者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因此，我们将幸福感潜变量进一步细化为两个新的潜变量“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在幸福感的测量上，遵循其标识变量的测量规则，“1”为最幸福，“5”为最不幸。

2、社会公平

样本数据中对“社会公平”这一潜变量进行测量的指标有5个，包括对收入分配政策、住房政策、就业机会、医疗保障、教育机会公平与否的看法。五个变量均为定序变量，其中“1”为非常公平，“4”为非常不公平。类似于上文对于“幸福感”潜变量的处理，笔者在此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会公正”进行细分。继而得到表4的分类：

通过上表中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公正”这一潜变量也被细分为2个新的潜变量。第一个潜变量所包含的测量指标包括：“您觉得当前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您觉得当前社会住房政策是否公平”，“您觉得当前社会就业机会是否公平”；第二个潜变量包括“您觉得当前社会医疗保障是否公平”，“您觉得当前社会教育机会是否公平”。很显然，第一个潜变量所包含的测量指标均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第二个潜变量所包含的测量指标则与“社会保障”问题有关。

在此基础上，笔者与前文的“生活幸福感”和“工

作幸福感”建立如下结构关系（见图1），进而分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对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对收入分配公平感和社会保障公平感、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连线，是由于通过以上因子分析，二者已是独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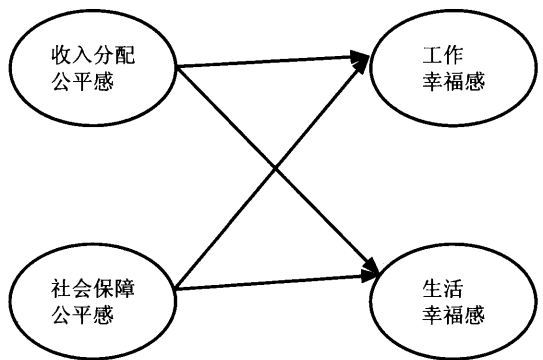


图1

四、公平感对两性幸福感的影响

(一)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1) 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测量指标间的关系；(2) 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本文的结构方程中，我们要估计的参数包括：(1) 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方程系数；(2) 标识变量与潜变量的测量方程系数；(3) 标识变量误差项的估计（反映剩余误差的大小）；(4) 误差项与误差项之间协方差的估计（反映标识变量之间的关联）；(5) 外生潜变量的方差。由于反应公平感的二个因子是独立关系，反应幸福感的二个因子亦独立，故本文不做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对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

表4 社会公正的因子分析

	主成分1	主成分2
Q71.您觉得当前收入分配政策是否公平	0.759	0.166
Q72.您觉得当前住房政策是否公平	0.510	0.445
Q73.您觉得当前就业机会是否公平	0.799	0.067
Q74.您觉得当前医疗保障是否公平	0.159	0.748
Q75.您觉得当前教育机会是否公平	0.097	0.779

采用GFI、AGFI、RMR、RMSEA进行检验，如果被检验模型的各项检验值与饱和模型越接近，模型的拟合优度越好。

我们关心的是两性之间“收入分配公正感”和“社会保障公正感”对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感产生多大的影响？究竟是收入分配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大？还是社会保障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大？进一步，我们还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对“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两个潜变量的作用。因此理论模型构造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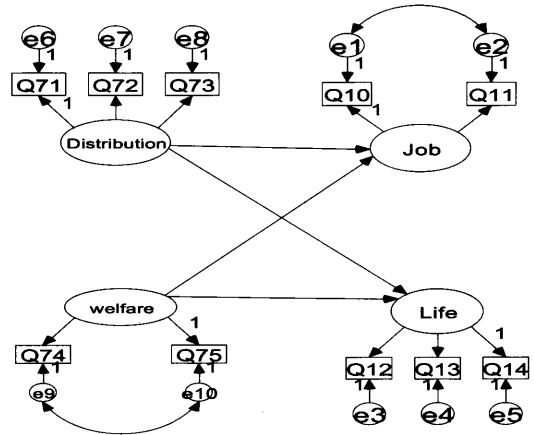


图2

(1) 结构方程：

$$\text{Job happiness} = a \cdot \text{distribution} + c \cdot \text{welfare}$$

$$\text{Life happiness} = b \cdot \text{distribution} + d \cdot \text{welfare}$$

(2) 测量方程：

$$Q10 = \beta1 \cdot \text{job} + e1$$

$$Q11 = \beta2 \cdot \text{job} + e2$$

$$Q12 = \beta3 \cdot \text{life} + e3$$

$$Q13 = \beta4 \cdot \text{life} + e4$$

$$Q14 = \beta5 \cdot \text{life} + e5$$

$$Q71 = \beta6 \cdot \text{distribution} + e6$$

$$Q72 = \beta7 \cdot \text{distribution} + e7$$

$$Q73 = \beta8 \cdot \text{distribution} + e8$$

$$Q74 = \beta9 \cdot \text{welfare} + e9$$

$$Q75 = \beta10 \cdot \text{welfare} + e10$$

本研究利用AMOS5.0软件来完成。分三个步骤：首先，分别对男性和女性两组样本建立初始的结构方程模型；其次，根据AMOS所提供的检验指数和修正系数，调整模型结构，建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结构方程模型；第三，根据理想的结构方程模型，讨论分析总体数据得出的结果。理想的结构方程图（见图2），各项参数值及检验值见表5-6。

(二) 基本判断

理论上讲，两性关系的平等，一方面要求两性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同时要求在男女平等的原则下，保障妇女优先发展，以弥补女性竞争力的不足；另外由于先天因素，男女两性各自的性别优势与潜能应该通过互补合作得到最大发挥。从这个意义出发，男女两性对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公平感的认识上是有差异的，对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以反映：

第一、“收入分配公平感”对“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都有显著正影响，但是对于两性幸福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收入分配公平感对于男性幸福感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从构成“收入分配公平感”的三个指标看，对两性来说，“就业机会公平”的影响最大；对于男性，“分配政策公平”次之，而对女性来说，则“住房分配公平”次之。

第二、“社会保障公平感”对两性的“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均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要更大些。“社会保障公平感”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尤其突出。

因此，“收入分配公平感”对男性幸福感的影响大，“社会保障公平感”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大。两性相比，男性幸福感更多体现在工作上，女性幸福感则体现在生活上。这表明二性的幸福感存在互补性

表5 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对幸福感影响

	男性		女性	
	Estimate	Z	Estimate	Z
结构模型				
生活幸福感 <-- 收入分配	.731	9.408	.509	8.114
工作幸福感 <-- 收入分配	.874	8.172	.576	6.466
工作幸福感 <-- 社会保障	.020	.215	.627	3.307
生活幸福感 <-- 社会保障	.293	4.816	1.571	5.266
测量模型				
工作状态 <-- 工作幸福感	1.000		1.000	
个人收入 <-- 工作幸福感	.878	6.209	1.382	6.834
居住条件 <-- 生活幸福感	1.000		1.000	
人际关系 <-- 生活幸福感	1.055	8.972	.756	9.301
家庭生活 <-- 生活幸福感	1.071	8.661	1.068	10.218
分配政策 <-- 收入分配	1.000		1.000	
住房政策 <-- 收入分配	.988	9.218	1.045	9.985
就业机会 <-- 收入分配	1.025	9.485	1.179	10.238
教育机会 <-- 社会保障	1.000		1.000	
医疗保障 <-- 社会保障	1.210	4.044	.930	4.141

表6 模型检验结果

	男性				女性			
	RMR	RMSEA	GFI	AGFI	RMR	RMSEA	GFI	AGFI
被检验模型	0.112	0.102	0.892	0.882	0.100	0.092	0.942	0.901
饱和模型	0.000		1.000		0.000		1.000	
独立模型	0.227	0.106	0.736	0.643	0.212	0.162	0.724	0.663

特征，女性更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提高竞争力来获得幸福感。

理论模型构造如下：

五、引入职业变量后，公平感对两性幸福感的影响

(一) 结构方程模型

经济学关于职业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的分析，分为“职业间差异”和“职业内差异”进行分析。本文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在公平感对幸福感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基础上，引入职业变量，观察职业对幸福感的影响。由于职业是定类数据，我们首先对职业变量进行虚拟化处理，以“其他”作为参照类，在AMOS中，定类数据通过虚拟化处理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图3作为图2的竞争模型，在图2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职业变量，我们希望观察职业的影响效应。引入职业虚拟变量后，

(二) 基本判断

与没有引入职业特征的结构方程相比，“收入分配公平感”和“社会保障公平感”对两性“工作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均有所下降。女性的“工作幸福感”大于男性，而职业女性的“生活幸福感”却小于男性。对幸福感的评价，“1”为最幸福，“5”为最不幸福，计算值越大，幸福感越低。我们根据职业的影响程度，对幸福感从高到低做一排序。

对男性来说，“工作幸福感”的排序为：机关干部、企业管理者、个体/私营从业者、工人/商业服务人员/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外来务工、失业下岗、离退休；

男性“生活幸福感”的排序为：机关干部、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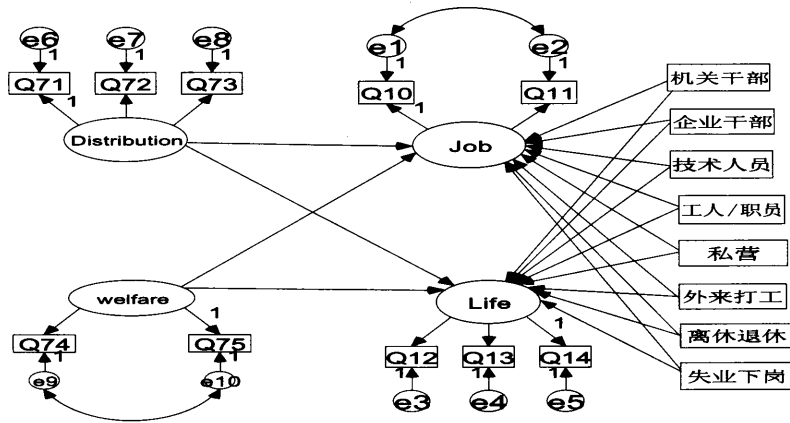


表7 收入分配公平感与社会保障公平感对两性幸福感的影响

	男性		女性	
	Estimate	Z	Estimate	Z
结构模型				
生活幸福感 <--- 收入分配	.547	8.729	.444	7.710
工作幸福感 <--- 收入分配	.064	3.343	.112	4.650
工作幸福感 <--- 社会保障	.008	.486	.151	3.157
生活幸福感 <--- 社会保障	.383	5.684	1.305	5.567
工作幸福感 <--- 机关干部	-.298	-4.642	-.499	-7.398
工作幸福感 <--- 企业管理者	-.252	-4.660	-.467	-7.205
工作幸福感 <--- 专业技术	-.233	-4.769	-.473	-8.288
工作幸福感 <--- 工商/职员	-.237	-4.921	-.412	-8.237
工作幸福感 <--- 个体/私营	-.239	-4.763	-.398	-7.526
工作幸福感 <--- 外来务工	-.186	-3.056	-.232	-2.466
工作幸福感 <--- 离退休	.158	4.591	.091	4.416
工作幸福感 <--- 失业下岗	.089	3.060	.103	3.029
生活幸福感 <--- 机关干部	-.157	-1.963	.000	.090
生活幸福感 <--- 企业管理者	.053	.804	.027	.303
生活幸福感 <--- 专业技术	.049	.931	.076	1.466
生活幸福感 <--- 工人/职员/商业	.144	3.440	.176	3.692
生活幸福感 <--- 个体/私营	.129	2.339	.138	2.035
生活幸福感 <--- 外来务工	.445	3.136	.268	1.267
生活幸福感 <--- 离退休	.156	3.444	.217	5.058
生活幸福感 <--- 失业下岗	.381	5.480	.520	6.689
测量模型				
工作状态 <--- 工作幸福感	1.000		1.000	
个人收入 <--- 工作幸福感	6.456	5.367	4.775	9.072
居住条件 <--- 生活幸福感	1.000		1.000	
人际关系 <--- 生活幸福感	1.042	8.879	.812	9.984
家庭生活 <--- 生活幸福感	1.018	8.334	1.117	10.964
分配政策 <--- 收入分配	1.000		1.000	
住房政策 <--- 收入分配	1.019	9.455	1.076	9.800
就业机会 <--- 收入分配	.995	9.425	1.114	9.844
教育机会 <--- 社会保障	1.000		1.000	
医疗保障 <--- 社会保障	1.125	5.083	.928	4.433

表8 模型检验结果

	男性				女性			
	RMR	RMSEA	GFI	AGFI	RMR	RMSEA	GFI	AGFI
被检验模型	0.081	0.119	0.892	0.851	0.081	0.102	0.906	0.871
饱和模型	0.000		1.000		0.000		1.000	
独立模型	0.133	0.145	0.736	0.705	0.126	0.136	0.746	0.716

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个体/私营从业者、工人/商业服务人员/职员、离退休、失业下岗、外来务工；

对女性来说，“工作幸福感”的排序为：机关干部、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商业服务人员/职员、个体/私营从业者、外来务工、失业下岗、离退休；

女性“生活幸福感”的排序为：机关干部、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商业服务人员/职员、个体私营从业者、离退休、外来务工、失业下岗。

综合来看，排在幸福感前面的均是收入和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业，而排在后面的是低收入和失业下岗人员。由于女性在收入和职业声望较高的正规部门工作的人数比例低于男性（48.5%>40.3%），而在离退休和失业下岗的比例高于男性（31.8%>26.3%），因此“拥挤理论假说”可以进一步用以解释两性幸福感的差异。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表明，民众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和收入分配公平感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是否以人为本，能否得到百姓的拥护，是可以透过百姓的幸福感体现出来的。从这意义上讲，幸福感应该成为制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政策的目标。

2、职业间幸福感比较显示，高收入和高声望职业的幸福高于低收入和低声望职业，这意味着收入与幸福感有显著关系。因此，一味强调幸福感，排斥GDP和人均收入是不应该的，因为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有赖于“蛋糕”的做大，有赖于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使人民群众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幸福感。

3、两性“工作幸福感”的比较显示，拥有职业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女性的“工作幸福感”，但由于女性必须承担生育天职，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

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责任，这又必然影响到“生活幸福感”。另外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往往是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和用人单位性别歧视的主要原因，因此女性“工作幸福感”与就业和收入分配政策有很大关系。国家在制定就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将性别意识纳入其主流，保障女性的基本权利。

4、两性“生活幸福感”的比较显示，“社会保障”对女性“生活幸福感”影响显著，本文的社会保障主要体现在“医疗”和“教育”两个方面。对妇女健康进行基本的保障，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家庭及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同样对于妇女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也有助于妇女收入的提高，增强妇女经济上的独立性，进而增加妇女的“生活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企业在制定职工培训计划上，也需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其决策中。

5、从幸福感的职业排序看，排在前几位的职业都是收入稳定，享有社会保障的职业，排在末位的是离退休、外来务工者和失业下岗人员。因此，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政策上，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其子女引入免费教育，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使他们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保障其医疗和公共卫生享有权利。

参考文献

- Alesina, A., R Di Tella. And R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9-10), 2009-2042.
- Bergmann, B, R (1974),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Wages and Profits when Employers Discriminate by Race and Sex,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July, pp103-110.
-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2000, Well-being over

- Time in Britain and USA, NBER Working Paper, No 7487,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 Bruno S Frey; Alois Stutzged, 2000,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Oct, pp 918-938.
- Bruno S. Frey; Alois Stutzged,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 pp402-435
- Carol Graham, Stefano Pettinato, 2002, Happiness and hardship: Opportunity and Insecurity in New Market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Diener, E. Suh E., Lucas R. & Smitn, H. L., 1999, Subject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25
- Diener, E. and Eunkook M. Suh, 2003,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mbridge, London: MIT Press.
- Easterlin, R. A.,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11 (473), 465-484.
- Oswald, A. 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107 (445), 1815-1831.
- Richard Rose, 2003, Health, Money and Wellbeing: Subject Responses to Post-Soviet Transforma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 曾慧超、袁岳, 2005, “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 载于汝信等主编《2005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风笑天, 林南等, 1998,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陆汉文, 2005, 《论世界的内涵与生活质量测量》, 《学术论坛》, 第11期。
- 罗楚亮, 2006,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 《经济学(季刊)》, 第3期。
- 邢占军, 2005, 《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人民出版社。
- 邢占军, 2006, 《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 《社会》, 2006年1期。
-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课题组, 2006,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 《妇女研究论丛》, 第2期。
- 孙凤, 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 清华大学熊知行楼305, 邮编100084
联系电话: 62771827-305 (o), 13717742985 (cell phone), 62782844 (h)
Email: sunfeng@tsinghua.edu.cn

附表

Item-Total Statistics

	Scale Mean if Item Deleted	Scale Variance if Item Deleted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
Q71、您觉得在现在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是否公平? (单选)	24.62	27.075	.409	.652
Q72.您觉得在现在社会在住房政策方面是否公平? (单选)	24.65	26.501	.396	.652
Q73.您觉得在现在社会在就业机会方面是否公平? (单选)	24.83	26.372	.411	.649
Q74.您觉得在现在社会在医疗保障方面是否公平? (单选)	24.76	27.305	.339	.662
Q75.您觉得在现在社会在教育机会方面是否公平? (单选)	25.10	27.395	.312	.667
Q10、您对个人收入的满意程度? (单选)	24.26	26.507	.351	.660
Q11、您对您目前工作的满意程度? (单选)	23.76	24.731	.261	.697
Q12、您对您目前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 (单选)	24.71	26.998	.360	.659
Q13、您对您目前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 (单选)	25.04	27.921	.326	.665
Q14、您的家庭生活幸福吗? (单选)	25.27	27.731	.415	.654